

蒋锦洪  著

经济发展中的

人本诉求研究

导论

经济发展中的人本诉求问题的提出

经济发展目的探求的思想演进

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发展「以人为本」思想及其当代发展

经济发展中的人本诉求的实质要义

经济发展中的人本诉求的基本内容

经济发展中的人本诉求的利益矛盾及其协调和调处

结语 人本诉求及其解决贯穿于经济发展的过程之中

上海辞书出版社

JINGJIFAZHANZHONGDE
RENBENSUQIU
YANJIU

经济发展中的 人本诉求 研究

JINGJIFAZHANZHONGDE
RENBENSUQIU
YANJIU

蒋锦洪□著

上海辞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经济发展中的人本诉求研究/蒋锦洪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 12

ISBN 978 - 7 - 5326 - 2417 - 1

I. 经... II. 蒋... III. 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202278 号

责任编辑 朱伟明
装帧设计 何香生

出版人 张晓敏

经济发展中的人本诉求研究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1.5 插页 1 字数 239 000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6 - 2417 - 1/F · 218

定价: 25.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66511611

亦将此书献给我仙逝的父亲：

蒋林先——一位勤劳朴实

厚道的上海市劳动模范

序

“好的生活”与“生活得好”

——蒋锦洪教授《经济发展中的人本诉求研究》

东方朔

我们不能回避那些被实用主义者轻蔑地称作“价值判断”的问题，“发展”必然是一个规范性概念，几乎同改进是同义语。如果佯装不知，则正好是隐瞒自己的价值判断。

——D. 西尔斯

任何一个经济学家都承认，GDP 并不能完全衡量经济的产出，更何况，许多对我们的福利和欲望满足的总水平极为重要的商品却不在市场交换范围之内。这些不交换的商品包括闲暇、家务劳动、社区氛围，以及外部的污染、拥挤——它们对我们的福利多寡至关重要，但这些并不反映在 GDP 里面。

——R. 布隆克

记得美国的经济思想史家 L. 汉内曾经说过，最早具有特定形态的经济思想，是在古代宗教的祭祀仪式和划分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处理生死存亡的目的之时出现的，比如古代雅典四年一次的浩大宗教祭会，必然触及相关的经济思想，而此时的所谓经济思想又往往以道德规范或宗教仪规的形式

表现出来。我们大体可以说,在人类早期的生活世界中,所谓经济乃是隶属于道德的,而那时的道德即表现为德性的完善和提高。在中国古代,孔子即有教言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今细参夫子之意,实非谓其一概排斥富贵,而是说富贵须以道德作主宰,当以义统利,否则“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或许是接此话题吧,《大学》进而提出了“德本财末”之说,所谓“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本末之论,强调了做一个有贤德的人当以德性价值之增进为尚,不以财利富贵为汲汲求取之目标,故夫子赞颜渊“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大学》即以“仁者以财发身”、“富润屋,德润身”诠释之,颇为传神地表达了儒家德性价值优先的基本立场。当然,此是对个人而言。就国家而论,管理者对家国之治理亦当将“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本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作为把柄,盖上好仁,则下自然好义,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如是者,则国安民善可期不远。相反,若治理家国之君王一门心思于财富之增长,无视民众德性之培植,其结果即难免于财聚而民散,故《大学》云:“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菑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①

审如是,即人们自不免将此看作是儒家义利之辩之纲

^① 甘乃光认为,在中国,汉以后的经济思想只不过是先秦的余绪罢了,就其本质精神而言,我们似乎可以同意他的略带“言重”的看法。参阅氏著《先秦经济思想史·自序》,商务印书馆1924年。

脉、精髓,此固是其中之了义、究竟义。不过,在古代的思想世界中,财富、经济之营为当服从于人之德性的提升,毋宁看作人类早期的某种共同特征。古代思想家大都认为,幸福和至善才是人生追求的目的,而达致这一目的却毋需依赖财富之积聚,因为富与德常常无法两立,财富的获得或支出,部分必然有悖于良心,因此,富人若要成为一个有德之人,要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在西方,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即认为,物质财富不是人生的目的,因而,经济活动必须与人类的其他活动结合起来,并仅仅将之作为实现其他活动的目的,如“幸福美满”而“有德性”的人生时才有意义。此处必须指出,所谓“幸福美满”乃是以“德性”为其内在规定的,殊非现代人常常认为的对有形物质所拥有的多寡^①。故而,亚氏认为,那些将“幸福”或“善”理解为单纯的“快乐”或“生活享受”的人,乃是“最为平庸的人”^②，“因为很显然财富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善,它只是有用的东西,以他物为目的。”^③甚至大而言之,一切研究,一切技术和实践皆必须以实现某种善为目标,“至于那些敛财者,是在那里受强制而生活着”,他们被财富所奴役,不得自由,故不能称之为生活。

将追求财富和追求有德性的生活看作是两难相容的生活目标,大体上表现了人类古代世界的某些共同特征。但若说西方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以“明快的自由思想……

① 亚氏认为,人生的最终目的乃是实现“幸福”(Eudaimonia),幸福乃是最高价值。但如此讲幸福,即幸福似乎是一个形式概念。不过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幸福一词不是以名利地位上为其实际内容的,相反,通观亚氏的整个伦理学和政治学,其所谓的幸福乃主要指的是一种理性灵魂的沉思活动。

②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1095b15。

③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1096a5~6。

为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作了准备”^①的话,那么,他们追求物质财富和享乐,“要求凡人的幸福”^②的观念即多少为经济学逐渐脱离伦理和神学的母体发生着催产士的作用。文艺复兴以后,个人主义以及对人类个性、尊严及其价值的重视导致了对人的理性、才能和欲求的探究,这一思潮竟一时成为整个欧罗巴大陆时髦和热门的话题,从培根、格劳秀斯、笛卡尔、霍布斯到洛克、曼德威尔、赫奇逊、沙甫慈伯利,他们大多以人性自利为基点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在经济思想方面,经由早期重商主义、威廉·配第的古典经济学、重农学派到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经济学的目的也似乎变得简单明快了,那就是如何通过策动“经济人”的自利心以增加国民财富,达到富国裕民、经世济民之目的。不过,正像斯密自己所言,“真正的政治经济学,即讨论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③而这样一种“性质和原因”之确定却是需要政治家和立法者相与参究的学问,若加之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的相关观念,人们愿意认为斯密之学说多少还具有人生价值之关切。^④不过,19世纪以后,西方的经济学出现了两派不同的研究趋向似乎是不争的事实,一派是以摈弃价值判断和道德考虑、以严格的数学演算为特征的经济理论,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45页。

② 周辅成:《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商务印书馆1966年,“编者序言”。

③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45页。

④ 此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亚当·斯密1759年出版《道德情操论》,越17年至1776年出版《国富论》,人或以为,斯密两书之间无论在性质、时间上皆相异甚远,尽可分别论之,不必将之看作一个整体。

要代表有数理学派、供应学派和货币学派；另一派则是把社会学、伦理学包融于一身的经济理论，主要代表有历史学派、制度学派和福利学派。前者伴随着哲学上由孔德(A. Comte)开其元的实证主义思潮的产生而产生，其研究重心由劳动价值论转向边际效用论，由人类需要转向人类欲望，由经济结构转向经济分析。出身于牛津大学的约索·威廉·西尼耳(1790—1864)平生的努力似乎就在于建立一门抽象演绎的、精密的“纯经济学”，他对以前的经济学家伸长自己的手脚，对自己原本不该涉足的哲学和道德等领域说三道四的现象颇有微词，主张经济学家的作用是纯学术的，对政府政策的价值取向或经济措施中的人本关怀等等应当保持缄默，其云：“一个政治经济学家的任务，不是建议应该干什么或不应该干什么，而只是说明不容忽视的一般原理。但是，如果以这类原理作为实际事务处理中唯一的——或者，即使是作为主要的——指导，那就既不当，事实上也恐怕行不通。”^①

显然，所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乃是一个价值问题，经济学家对此类问题应当加以“搁置”，而所谓“不容忽视的一般原理”即是以“事实”为基础所建立的严格的因果关系原理，这些原理无需经由繁难的论证即可为人们理所当然地接受，比如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投入来获取尽可能大的利益、劳动能力借助于资本可无限制增加等等。西尼耳的这一观念转手到 W. S. 杰文斯那里，即经济学之语言似乎变得最好由数学公式或数理符号来表示。杰文斯所以如此主张

^① 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大纲》，商务印书馆 1986 年，第 12 页。

亦自有其理由,盖杰氏认为“一切科学的经济学家皆须是数理的经济学家,其理至明,因经济学家所讨论的是经济量及其关系,但一切的量与量的关系皆属于数学的范围。”^①职是之故,杰氏要把人的主观欲望与效率、人的快乐与痛苦一概翻译成数学公式。杰氏宣称,经济学实际上就是“快乐和痛苦的微积分学。”^②如随着某一商品消费量的增加,人们所获得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这一现象用数学公式来表示即是 $du/dx = f'(x)$ 。其中 u 是效用, x 是所消费的商品数量,两者的关系是 $u=f(x)$ 。明乎此,即难怪 G. J. 斯蒂格勒会认为,自杰文斯等人的边际革命以后,“经济理论从一种艺术(在许多方面是文学的)被改变为一种日益严密的科学。”^③但如果人的苦乐可以数学的微分函数来加以表示和确定的话,那么,人的精神世界在逻辑上也可以被分解为数字上的差别,并通过数字求取其间的“一般均衡”。或许这并不在一般的数理经济学家的“法眼”之中,因为他们无意于对所谓人的价值意义世界的问题发表言论,退一步,即便要关注此类问题,他们亦喜欢首先将人的此类愿望和追求化约为人类的最基本的、同时也是最原始的满足欲望和避免牺牲的“行为动机”,而这些动机却可以通过货币来加以测定,被誉为经济学发展史上承先启后的新古典学派的创始人 A. 马歇尔对此似乎并不讳言,他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一般生活事务的学问,它研究个人和

① 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第 10 页。

② 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第 2 页。杰氏此言从哲学上看显然上承功利主义者边沁等人之语绪,固不待言也。

③ 转引自 D. 温奇“边际主义和经济科学的界限”,载 R. D. C. 布莱克等编《经济学的边际革命——说明和评价》,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第 63~64 页。

社会活动中与获取和使用物质福利必需品最密切相关的那一部分。”^①大概明眼人一看便知,马歇尔所谓的“那一部分”无非是人的欲望与物质财富。人虽然有各色各样的追求,既期望富裕、安全、健康,也期望平等、自由和人生的幸福,不过在马歇尔的视界中,对人发生影响的主要或根本因素却是经济力量。依马歇尔,发生在人们身上的“身体的、精神的和道德的不健康,虽然部分是由于贫困以外的其他原因,但贫困却是主要原因。”^②审如是,即经济学的任务也便昭然若揭,那便是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具体的方法即是激发潜藏于人性深处的欲望,齐心协力把经济数量这一蛋糕做得越大越好,马歇尔断言,“人类的全部历史表明,人的欲望是随着他的财富和知识的增长而扩大的。”^③

不难看出,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经济学就其主流而言已从古典的政治经济学中逐渐摈弃了哲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价值论的思考,他们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对现实经济现象的实证性解释,并且力图把经济学变成如数学或物理学一样严密和精确的语言系统,他们寻求的是效率,讲求的是“投入——产出分析”、“成本——利益分析”,热衷的是数学模型的建立。此处我们顺便提出,在正统的经济思想史中,马克斯·韦伯可能并不会被那些经济学家认可,尽管他对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论著早已被置于经典之列^④。韦伯

①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3页。

②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4页。

③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40页。

④ 韦伯在经济学方面的主要论著有“社会科学认识与社会政策认识的客观性”(1904)、“剔除社会学和经济学之价值判断的意义”、“论社会科学与经济科学之价值中立的意义”(1918)、“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经济与社会”(1921)和“世界经济通史”(1923)等。

一生非常注重精神价值的研究,对追求数量和效益的片面的经济发展观念所包含的隐忧也有过人的敏感和洞察。然而,在与当时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施穆勒的争论中,韦伯却严守价值中立的立场,反对把价值判断带入经济学领域。施穆勒主张,经济学不应仅仅只是技术性的、只追求效率的学问,而应当包括心理学和伦理学在内,因为经济生活本质上乃是一种文化生活,其内在地包含着道义的、伦理的价值。施氏认为,经济的文化世界从其产生就应当归功于人们的精神力量,“我们称作‘经济’的,是指由相互联系的个人所构成的或大或小的集体,构成这种联系的因素是心理的、道德的或者是法律的因素。”^①因而毫不奇怪,经济问题唯其与伦理道德问题关联互顾才能最终得到合理的说明和解决。然而,对于施穆勒的观点,韦伯却认为,作为科学研究我们应把事实与价值严格区分开来,当我们以价值的“应然”(ought to be)去分析事物时,我们就将远离事物的客观特性,因为价值判断只具有某种主观的性质,总是因各人所持有的不同的价值尺度而各个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所谓正确与错误之分我们无法获得科学的结论^②。比如我们身处在一个社会,富人可以以高昂的价格购买名贵的食物来豢养他的爱犬,而穷人连一天三顿饭都难以吃饱,对于这种人、狗之间所呈现出来的极端不合理的现象,我们可能会充满道德义

① 季陶达主编:《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商务印书馆 1963 年,第 341 页。

② 韦伯的这种立场乃上承休谟“事实”与“价值”两分的观点而来,而这种观点在西方哲学史上被人们称为“休谟的断头台”(Hume's guillotine)。请参阅石元康《从中国文化到现代性:典范转移?》,台湾东大图书公司 1998 年,第 105~123 页。

愤,但是,就分析一种经济现象或社会制度而言,这样一种道德义愤即便可以理解,也还仅仅属于一种价值判断句法,客观事实本身并不理会人们对其所持有的看法。然而,这并不是说韦伯只是一味反对价值判断本身,他只是提醒我们在面对上述问题时应首先在“事实认知”与“价值评价”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经济理论研究的是“是什么”的问题,经济政策却可以讨论“应当是什么”的问题。^①

尽管在韦伯同时或在其前后都有对经济学理论是否应当包含价值判断的问题有不同的争论和看法,不过,韦伯的这一主张却是20世纪初期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的基本立场,他们力图避免经济研究中的价值判断,以实证为方法,以效率为优先,以坚硬的数字为主臬。奥地利经济学家冯·米塞斯认为,如果以道德监察官的主观好恶来判断社会事实,将是毫无意义的;凯恩斯则主张经济学研究应驱除伦理上的考虑,“实证经济学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事物本相(what is)的系统化的知识门类;规范的或规制的科学,则可以被定义为关于判别事物是否具有可取性(what ought to be)的标准的系统化的知识门类,它关注人的理想,而与实际状况无关,至于手段,则是实现给定目标的一个规则系统。”^②而L. 罗宾斯则干脆认为:“经济学涉及的是可以确定的事实,伦理学涉及的是估价与义务,这两个领域风马牛不相及,在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的法则之间有一条明确无误的逻辑鸿沟。”^③言之凿凿之中,浸淫摇荡之下,效率之提升、财富之增长、GNP、GDP之

① 参阅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67~281页。

② 参阅《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华夏出版社2001年,第22页。

③ 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20页。

变化曲线即如一盏黑夜途中前方摇曳的灯光,遮点着经济学家们心中的全幅寄怀^①,这就难怪 I. 沃勒斯坦会认为:“获得‘更多’就是发展,这是普罗米修斯式的神话,是一切欲望的实现,是享乐和权势的结合,也可以说是两者的融合。”^②

经济学研究中的精密化所导致的经济发展的数量化倾向,或许蕴含了这样一个基本观念,即只要通过定量分析、依靠经济的增量扩张便可以解决相关的社会问题。这种假设并非是无中生有的主观臆想,当年凯恩斯即试图通过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来刺激需求,又通过需求的增加反过来刺激投资和经济增长,从而达到缓解失业的目的。他们的中心哲学似乎认为,只要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的量便可化解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可能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过,凯恩斯的计划“精确”地“失效”了。我们且不说在单纯的经济增长的旗帜下可能导致资源供给的紧张、生态失衡的破坏等现实的、但同时也是透支未来的问题,而一旦我们以经济增长来全幅地代表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的高低时,那么,类似于加尔布雷斯所吟唱的“丰裕社会”中的“贫困”的咏叹调便不是偶有的赚取人们廉价同情的低吟独唱,而可能是一出长剧中的一首短小的序曲^③:经济增长是否就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效

① 大体我们可以说,有何种经济理论形式即有何种经济发展方式,两者之间常常犹一枚钱币的两面。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客观化、精密化倾向,在理论上,固不必一定导致经济发展集中于数量上的增加,然而,此一倾向实际上所造成的结果却可以反过来证明两者之间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② 参阅《发展的幻象》,中央编译局 2001 年,第 4 页。

③ 加尔布雷斯乃美国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学说乃针对凯恩斯未能解决经济社会中的“滞胀”问题,著有《丰裕社会》(1958)、《新工业国》(1967)、《经济学和公共目标》(1973)。

率的提高是否可以精确地反映人们的真实生活?人们所取得的福利是否只止于物质产品数量上的多寡?一句话,“好的生活”是否可以等同于“生活得好”?

人生的意义丧失在“效率”的迷宫之中,造成“生命世界的殖民化”(the colonization of life-world),哲学家只是以另一种语言表达着经济学家相同的幽怨。

道理其实并不复杂。若说经济总是关于人、为了人的经济,而不是相反,人被变成单纯是经济的,那么,经济或经济学研究中对“客观事实”之注重,对“数学模型”之迷执,便总是与忽略人的其他方面如精神的、文化的、自由平等的需求相伴相随^①。理论上,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指责那些纯经济学家对于科学研究中主张客观实证,拒斥主观价值判断的正当诉求。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涉人的经济事项、经济现象,我们是否可以真正做到“价值中立”(value neutral),对于人的复杂的动机——需求系统的知识是否可以纯然将之归入经验知识之列?这显然是有待讨论的问题,未敢轻易笃笃断言。而若对此一问题不复有悬解,即其他问题亦必将接踵而至,此亦理之易明者。执诸历史发展的辩证眼光,经济学研究中数学语言之出现固然精确化了经济分析,使得满足于“大概”、“差不多”甚至于主观“想像”的经济论说获得了一个历史性的巨大转折。然而,推延跌宕之下,人本身亦只作为

① 谁都不会认为,当代主流经济学会否认人的自由,相反,他们认为,正是市场经济才真正将个人的自由、责任与个人的实在利益相互结合在一起。不过,当他们如此这般地理解自由时,这种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市场经济中自发拓展秩序的自由,而非人们真实享有教育、医疗、参与民主和公平的社会讨论的自由。学者可参阅阿马蒂亚·森的相关研究。

数学模型的工具假设和功能性要素被置于经济分析之中,便使得经济学纯粹成为一种“殖财术”,何况数学语言毕竟是僵死的、阴冷的、纯形式的,它如何表达有灵魂有肉体、有情欲冲动有精神追求的人的经济活动似颇有可争可议之处,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①等书中所描绘的精神与肉体之分裂、社会选择与社会计划之游离、经济化方式与社会学化方式之紧张以及禁欲苦行主义(asceticism)和贪婪攫取性(acquisitiveness)之间的变轨,似乎将韦伯所说的“专门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肝肠”的另类“现代性”作了别有一番滋味的阐发。

事实上,经济学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除了有其客观性、精密性一面之外,与价值观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尽管其表达方式可能并不等同于哲学和伦理学。一种经济理论总是以其特殊的方式转化为某种特定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并以此来规定、折射人类所追求的价值远景世界。不过,此中仍有其可分析之处,我们即以“成本——利益分析”或“投入——产出分析”为例,站在纯粹的道德的立场,我们或许会认为,这种由经济学的精确化所带来的精打细算、量入为出的经济理性埋葬了曾经撩人起怀的道德英雄主义的豪情,若作为一种生活原则,即会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带入赤裸裸的利益计算之中。然而,换一个角度,我们亦未尝不可以同意韦伯所说的,这一原则宣告了一个时代的到来。它通过每一个人自身的利害关系而不是通过军队、法庭和绞

^① 参阅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6年;《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

刑架来遏制人们的懒散、疏忽、任性、无能、无效率以及作恶的天赋倾向，“它鼓励而不是阻止个人对其行为负责，培养一种切实可行的责任体系，并给人强加一种道德责任感，以作为维持生活标准的一种条件。”^①假如上述说法多少还有其理据的话，我们由此所能得出的结论或许是，由经济学的精确化所拖带出来的某些现象或“副产品”亦有其正面的积极的作用。不过，说明这一点却并不能证明经济理论可以全然脱离人本的、道德的诉求，“事实上，经济不是‘脱离道德的’，经济不仅仅受经济规律的控制，而且也是由人来决定的。在人的意愿和选择里总是有一个由期望、标准、观点以及道德想像所组成的合唱在起作用。人的行为遵循极为复杂的想像，而其中有关经济的想像只占一部分……道德性问题并不与经济学理论相矛盾，它必须接受这一理论并询问道，是否在经济学理论中现实的所有方面都得到了应有的重视？”^②我们或许可以说，任何一种经济体系之建立皆表达了人们所欲达成的目的，并力图使社会朝向此一目的或理想模式演进。经济观念是理论，也是多中取一的选择；是理想，更是现实的计划。它们所表达的不仅是我们眼前所面临和认知的事实，同时还表达了人生的重要目的和特定的价值感，比如人们在经济上希望获得物质富足、公平分配、机会均等的同时，亦希望获得尊严、健康、幸福和参与行动的能力等等，所有这些，我们似乎颇难通过某种复杂的“化学还原”的方式以经济数量

^① 爱德华·诺曼“抨击资本主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和道德败坏”，转引自 R. T. 诺兰等著《伦理学与现实生活》，华夏出版社 1988 年，第 328 页。

^② P. 科斯洛夫斯基：《资本主义的伦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 年，第 3~5 页。